

收稿日期:2025-10-12

江谦“三育并举”教育实践考察： 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的初期探索(1902—1914)

赵娟

(上海建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江谦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早期主要就职于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民办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江谦曾参与通师的创设,并长期在通师任教、主持行政事务。其间,他大力推动国文教学法改革、促进通师学科布局逐渐成形,成功助推通师晋升为国内一流名校,有力促进了江苏教育近代化和南通城的近代化发展。早在通师,江谦即注重“知行合一”的修身教育,坚持“国学为本”“实业为用”的人才培养理念,重视体操教学改革以培养尚武精神,这些为其此后于南高师提出并实施德智体“三育并举”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江谦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可以为当今教育强国建设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坚持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江谦;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三育并举”;文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659.29;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4-0096-09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江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C2024289)。

作者简介:赵娟(1972—),女,江苏扬州人,上海建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4.009

江谦(1876—1942)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文字改革家,他一生的教育事业主要包括:主持张謇1902年创办的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民办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以下简称“通师”)工作,使通师成为全国名校;创办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名校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并担任首任校长,使南高师“比肩北大”。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江谦早年专职履职于通师时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这是其后期于南高师提出并实施德智体“三育并举”教育思想的初期探索。

1911年至1919年间的《南通师范校友会杂志》、1943年蒋维乔撰写的《江易园居士传》(《觉有情》,1943年第85—86期)等,对江谦在通师的教育成就有所记述。《南通市教育界人物传(1919年—1988年)》^{[1]63-67}则首次对江谦在通师的具体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做了大概介绍。朱嘉耀主编的《南通师范学校史》^[2]是了解江谦在通师进行教育改革的重要资料。赵娟撰写的著

作《近代教育先驱:江谦生平及思想研究》^[3]对江谦一生的主要事迹及思想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江谦对通师的贡献,对其教育思想也有所论述,但仍不够深入。在学术论文方面,相关作者对江谦与张謇的关系、江谦在通师的教育实践等情况做了初步介绍,指出江谦是“一代教育大家”,并肯定了江谦对江苏教育近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但对江谦在通师的具体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以及如何推进江苏教育近代化进程,尚缺乏深入系统研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因此,深入、系统地对江谦在通师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进行综合研究,挖掘其对推动江苏教育乃至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实有必要:不仅可以了解其日后在南高师提出并实施德智体“三育并举”教育思想的过程,还可以了解南高师“三育并举”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方针的重要影响,为当今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借鉴。

一、江谦在通师的教育实践:参与创设、基层任教与主持行政事务

江谦任职于通师始于1902年,终于1928年,前后长达26年,其中,1902年至1914年专职履职于通师。从一线教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乃至杰出教育家,他虽饱受教育转型煎熬,但渐谙教育规律,成为民国大学校长中推动中国旧教育向新教育转型的杰出代表。江谦长期扎根基层教学,这为其日后在教育领域大胆改革、推进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则为其大刀阔斧实行教育改革提供了方便之门。

(一) 佐助张謇兴办教育:参与通师创设

江谦出生于书香世家,既接受过系统且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接受过近代最早的新式师范教育,集传统儒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为一身,是张謇在教育领域最为器重的学生。因受命佐助张謇实现“兴学育才宏愿”^[4],江谦进入教育领域,自此执着于教育救国事业。江谦不仅参与了通师创设,还是张謇创校团队的重要成员。在学校名称确定、建筑施工等方面,江谦均参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江谦还参与了包括开办章程、招生内容、课程设置、教师考核、职务职责、学校管理等在内的《通州师范学校章程》的制定。从学校开工建设到招生运营,江谦无不参与其中,使通师发展为国内知名院校成为可能,也为其日后创办南高师并担任首任校长,把南高师打造成比肩北大的名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二) 担任基层国文教习:推动教学改革

早在通师初开讲习之时,江谦“即忝为师”^[5]。1903年,江谦从国文教习做起,在基层一线历经锤炼与打磨。张謇对师资的选择与聘请极其严格,通师聘请的不仅有多名日籍教师,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江谦曾与王国维共事两年有余,二人均授国文。彼时任教于通师的王国维曾发表论文《论教育之宗旨》,提出教育应培养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完全发展之人,这对江谦日后高度重视体育教育,并将之与德育、智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应有重要启示。江谦在任国文教习时努力进取,十分注重向其他教师请教,并通过听课等方式不断提高授课水平和育人能力。如他曾连续听课学习日籍教师木造高俊的课程。通师学生尤慎铭在毕业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国文教习江谦曾一度在教室旁听”^[6]。江谦长期在通师承担基层国文教学工作,在倡导国文“良善之教法”、使用“合声简字”推广教育普及、改革国语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先驱作用。

江谦主张对传统教师“无良善之教法”^[7]进行改造。身为国文教习,江谦注意到传统教师尤其是清末科举废除之前的教师,“一直是官僚体系的附属物,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8]。僵化的传统填鸭式教授方法在新旧教育转型时期呈现出落后性和不适宜性,因此,务必进行国文教学改革。在教法方面,江谦推崇“不事考据,专重性理”;在作文方面,倡导去“科举时之浮华架空繁

难之文字”以“趋于简朴”^{[1]65}。为推动国文教学方法改革,江谦通过报刊发动全国学界同仁共同探究国文教学改良方法,最终形成了“国文教授四步骤”^[9],即识字、读书、习字、作文,并于通师加以推广。江谦还在使用合声简字推广教育普及、使用京音统一国语等方面提出了改良意见并被政府采纳。他不仅在通师推行合声简字学习试验,还广泛宣讲音韵学说,在全国影响甚广。此外,江谦在数学教育方面推进珠心算实用课程,强化体操课程教学改革,主张建立实训基地、倡导理实结合,等。这些改革尝试,反映了江谦着手中国教育改革的迫切心态和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

(三) 担负行政管理要务:促进良性发展

清季民初,国势颓衰,民办通师面临资金窘迫的问题,另外还存在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不稳的情况。通师从1903年正式开校至1905年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换过两次监理。1906年1月江谦由一线教师被提拔为学校监理,后逐渐成长为通师的代校长和校长,至1914年他被学部任命为江苏最高学府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大约8年时间,就使通师步入正轨,并快速迈入近代化发展通道。由于表现卓越,1909年后,江谦还先后作为安徽咨议局议员、京师资政院议员、中央教育会会员、安徽教育司司长、安徽议会副议长、国会众议院议员、江苏教育司司长、安徽教育会会长,活跃于江苏与全国教育领域,成为江苏教育会及晚清学部改革的重要人物。为奖励其对教育所建之功勋,1915年11月民国政府给江谦颁发了“三等嘉禾章”^[10]。

江谦任监理四年,成效显著。彼时因张謇事务繁忙,江谦实际负责主持学校事务,地位仅次于张謇。在行政管理方面,通师设立教务、舍务、庶务三个部门,分工明确,细化了原来笼统的教务工作,强化了教育事务的落实和责任管理。在学科设置方面,相继设立测绘科、农科、工科和蚕科四专科,旧教育特点慢慢褪去,近代教育学科态势渐趋明朗。在人才培养方面,在农业、水利、城建等方面为张謇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同时为通师构建了一支优秀的管理人员梯队,包括顾公毅(1881—1955)、于忱(1877—1956)和缪文功(1871—1944)等。顾公毅等人均是通师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优秀学子,在通师的培养下,从普通教师成长为独立担当的行政管理人才,不仅成为江谦管理通师的得力助手,日后也在推动通师发展和南通近代基础教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质言之,通师在江谦与张謇的长期努力下,最终“树各省先声”“成绩昭著”^[11]。在通师从普通师范发展为名校的过程中,江谦功不可没。

二、江谦“三育并举”思想在通师的早期实践

1915年,江谦曾在《江谦关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状况报告书》一文中,对南高师的办学思路进行了系统总结,明确了“训育、教授、体育”之主张^{[12]34-37};1918年,南高师代理校长郭秉文在《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中进一步归纳为“训育、智育、体育”^{[12]45-53},即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追溯南高师“三育并举”思想的来源,即可发现:江谦在通师就已提出的有关修身教育、“国学为本”与“实业为用”、体操教学等方面的教育思想,应是其日后担任南高师校长提出的“三育并举”教育主张的萌芽。

正如有些学者所语,近代教育事业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思想,“就其渊源关系而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早期实践功不可没”^[13]。江谦应是近代中国倡导并先行实践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近代化教育思想的著名教育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14]江谦推动传统旧教育向新教育转变,开创了近代师范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先河,及时满足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南通和国家对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验证了教育与社会经济及国家发展

之间的利害关系。

(一) 重视修身教育,注重知行合一

21世纪初,南京大学将1916年南高师首任校长江谦作词的校歌《诚》再次确定为校歌。江谦曾语:“本校校训所用诚字,诚者自成,所以成物;先圣至言,实为教育精神之根本。”^{[12]36}南高师以“诚”为校训、以“诚”为校歌,且贯穿于“训育、教授、体育”三育之始终,足见江谦对修身教育的高度重视。他自1906年任通师监理始,就格外重视学生修养中“国家思想”的教育,这是科举废除之后江谦对学校教育“首列修身”、修身为“各科之冠而教育之中心也”^[15]的重要认同,也是他努力践行张謇创校初提出的“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16]17}教育大纲的重要体现。江谦认为加强学生道德修养是教育的根本之所在,因为“一人修身之得失一生之荣悴系之,国民修身之得失一国之隆替随之”^[15]。江谦在《小学教育改良之四案》一文中论述的“案四”即为“修身教育”问题^[17],此文传播广泛,发表于1910年10月29日《申报》第2版、1910年第254期的《广益丛报》、1911年第73至76期的《吉林教育官报》及通师校报等。

江谦主张“国学为育德之本”^{[3]171},即用国学内容来培养学生良好德行修养,“育德”是为“修身”。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在诸多国人质疑儒学未能担负起救国重任之际,江谦在师学日本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独有的清醒。他坚持认为国学教育关系到学生道德之养成,对外国文明的一切吸收均须建立于国学基础之上。对于国学中何种内容适宜育德、如何通过国学育德,江谦亦有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江谦在通师设置“经课”,提倡通过阅读“四书”“五经”来弥补道德教育之缺憾。他还建议国家把我国古代传统礼节与时代发展之需相结合,编成“三礼”,即通礼、官礼、外交礼,传授于学生,强调对古礼须有效择取而非全盘接受,不能为今所用之封建糟粕,如跪拜之礼等,理当摒弃,对于近代发展所需的外交礼仪需统一“编列作法”^[15],以彰显文明风范。另一方面,江谦重视教材的编写。为去除千年科举沉积的不以不能农工商为耻、反以不为农工商为荣的弊病,改变当时学生普遍存在的“尊治学而贱治生”“重文事而轻力作”^[18]倾向和学者通常具有的口舌勤、心志昏、手足懒毛病,江谦“遍搜四史”,从中找出“皆有德有功有学”^[19]的三十七名学者,汇编成《两汉学风》《两汉兴学劝农诏令》,传示全校,以弘扬两汉之“能耕能读”“力田孝弟”的朴实风气,全力培养学生治学治生两不误、文事力作皆能应的好品行。江谦还建议国家编写统一修身教材,教材编写应通俗易懂,且图文并茂。统一修身教材的提倡,可令学生有所遵循,教师有据可范。此举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国家在修身教育中的统领和指导作用,与当今思政教育编写使用全国统一教材的做法不谋而合。

对于修身之法,江谦因对阳明“心学”有着深入研究,故主张“知行合一”。江谦认为德育须关注实效,只靠讲理论故事等僵化固定的授课形式是不可取的,如此只会“知行永分”“德育无效”^[15],故德育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教师需有修养之功夫。教育者本人如没有浩然之正气,必然无法引出学生心地之光明,达不到感化与教化他人的德育之宗旨。其次,教师需以身示范。中国古代教育向来重视身教重于言教。1915年,江谦曾于江苏教育会举办的、江苏各校校长参加的会议上,做了以“注重以身作则为改良社会教育之要旨”的演说。整个演讲围绕“以身作则”阐述改良社会的前提,体现了其有关德育实施的重要主张。再次,德育课程的授课形式切不可理论与实践分离。江谦反对德育理论课固化为“讲故事”、实践课与理论课脱轨,以致各行其是,最终知行分离,德育无效。他认为德育课程的授课形式须有自身之特点,切勿掉入国文等学科的教学框架,不应靠死记硬背、分数量化来评定德育高低,而应用仁爱善意之礼循循善诱,既有故事又有理论,如是系统训练数年,“修身之效必著”^[15]。江谦在通师产生的有关德育的思想最终在他创办南高师时形成全方位育人思想,直到今天,南京大学仍延续着江谦确立的“知行

合一”的精神传统。

(二) 坚持“国学为本”,强调“实业为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救国成为时代呼声。江谦立足传统教育之基,努力吸收近代西方教育之髓,强调师范生的培养须注重“根本与应用”两方面,遂形成了以“国学为根本”,以“实业为应用”^{[1]65-66}的近代教育思想。江谦既注重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又十分注重学生对近代技能知识的研习与运用,要求他们能将学校所学灵活应用于毕业后的实际生活与工作之中。“国学为本”“实业为用”既是其独立思想与务实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其有关智育目标与内容的早期表述。

坚持以“国学为根本”,是江谦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他在西学东渐时期勇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的表征^{[2]218},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谦在人才培养中对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坚持。他认为“国学是各科之根本”^{[1]64},强调凡事不培根本而只图枝叶繁茂,必然“劳而寡效”^[20]。他批评“醉心欧化,鄙夷国学”的媚外现象,强调对外国文明的一切吸收,必须建立于“国粹是本”^[7]的基础之上。国粹就是国学,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学内容博大精深,其根本是国文^[20]。江谦认为,国文的学习可以为人才培养奠定宽厚的文化和道德根基。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重教学技巧,以培养学生融会贯通的学习能力。江谦认为,要想学好国文,需从识字开始,只要“学生把二三千字的音、形、义弄懂搞通,读书中遇有一般困难,就能迎刃而解”^{[1]64}。而要想学好识字课程,最佳方式莫过于借助合声简字,以京音为标准的统一国语。江谦研究的合声简字曾“风行直隶、山西两省”,即合声简字不仅流行于江苏、上海、浙江等省,还风行于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有力推动了教育普及。“夫习简字者,直隶、山西、江宁等处已不下数十万人,编成之书数百种。”^[15]江谦因此成为近代国语教育的先驱^[17],他在音韵学方面形成的极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说音》则成为民国时期中小学的必选教材。在通师课程设置上,国文是必学课程,且课时安排超过英文课程。他本人在通师还亲授国文,内容以四书为主,同时辅以古史及杂文等。由上观之,江谦以“国学为根本”的思想无论是在教学内容还是培养目标上,与今天的智育已十分接近。

以“实业为应用”,是江谦教育思想中注重应用的重要体现,侧面反映出他在人才培养中注重学习借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迫切心理。此处的“实业”既包含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各项事业,也包括中国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发展的各类事业。“应用”即运用。以“实业为应用”即人才培养需服务于近代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具有“以实用为准”的特征,是对张謇提出的实业救国思想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具体回应。实际是指江谦在为张謇创办的地方实业培养各类人才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谋生能力,这与当今智育注重培养学生实验能力与创造能力等显然十分吻合。千百年来,儒学的社会局限性在封闭环境中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到近代,在中国被迫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其局限性日益彰显。江谦在为南通农校学生所办杂志撰写的序言中曾指出“士有乏食之叹,而学有鹜虚之病”^[21],意指传统教育存在与实际脱离的问题,认为有必要在保留国学基础上适当嫁接西方教育理念,即注重运用,而运用的载体即为实业。江谦认为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有诸多余毒,如重视“治学”而鄙视“治生”、重视“文事”而轻视“力作”^[18]等,以致学生毕业后不仅不以“不能农工商役”^[22]为耻,反而以之为荣,这对追赶西方发展,尤其对张謇在南通创办的诸多实业如垦牧、棉纺织、水利等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故江谦在通师创设初期除开设地理、数学、理化、教育等近代化课程外,随着张謇实业创建种类和规模扩大,还增开测绘科、农科、工科和蚕科四专科,以更好地服务于培养地方实业发展所需的测量、垦牧、施工和蚕桑养殖等人才。

江谦以国学为本、以实业为用的近代化教育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既求稳保守又渴望开放的心理,与彼时教育转型的时代背景有关,本质上体现的是如何平衡传统儒学与科学精神二者关系的问题。虽然这种心理影响了江谦后期对教育改革的推进,如他曾反对南高师继任校长郭秉文的男女同校等思想,但整体来看,江谦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为近代化发展服务之人才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这一思想最终在南高师办学时完善为江谦的智育思想,即思想能“以探智识之本”,应用能“以求智识之归”^[22],已具备现代智育的内涵。

(三) 改革体操教学,落实“尚武”教育

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体育课程开始在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结束了我国体育课程长期缺席的历史。1906年,清政府规定各类学堂各种教科书,均须“寓军国民主义”,培养“振武之精神”^[23]⁵⁴⁹²⁻⁵⁴⁹⁷。系列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使得兵式体操成为清末主要体育课程,此种安排直至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才日渐式微。江谦任监理时恰逢清政府实施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面对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秉持教育救国、救亡图存思想的江谦十分赞成培养学子的振武精神。民国初年,面对全国多校出现的在校生死亡且死者中女生多于男生的现象,江谦深感痛心,认为是女生身体普遍弱于男生之故^[24]。1912年3月,通师聘请了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体操教员,由专业人员教授兵式体操,以确保体操课之质量。江谦对体育教育的重视显然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主动承担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实的社会责任。

兵式体操作为彼时体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明显带有近代抵御外侮的时代特征,江谦进一步提出:“如于初等四五年及高等小学体操,兼习拳法、刀法(刀削竹为之),以保固有之国粹而立武备之基础,至中学以上,兼及游泳、竞漕、击剑诸术。”^[15]如此,振武精神必会养成。江谦深感教师之职劳苦尤甚,考虑到师范生毕业后从教之路的辛苦,便格外重视学生身体素质的康健,在通师期间即要求学生每天清晨养成练习“二分间体操”^[16]⁶⁵⁻⁶⁶之习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1916年通师学生在江苏省立学校第三次联合运动会上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三的优异成绩。江谦在通师对体育教育的高度重视后来发展为南高师创校之初“三育并举”思想中体育育人的主张:1915年江谦就任南高师校长之初即十分注重体育,要求学生每日晨起须做米勒氏五分钟呼吸运动^①,后于全国高校中首开体育专修科,极大促进了体育教育的近代化。在江谦的影响下,国立北高师于翌年设立体育专修科,全国各地高等师范学校,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等,纷纷设立体育专修科或体育系,反映出南高师重视体育教育、首设体育专修科对全国高校的影响之大。

需要指出的是,江谦在南高师提出德智体“三育并举”教育思想,必然离不开他早期在通师的教育实践,也离不开王国维“四育并举”思想和教育总长蔡元培“五育并举”思想的启迪,还离不开江苏教育会副会长兼好友黄炎培与近代留美教育学博士第一人、曾被其聘为南高师教务主任的郭秉文等人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施“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并进一步发展为直到当下仍在贯彻执行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方针,可见江谦于南高师实施“三育并举”措施在我国教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而他在通师的教育实践更显难能可贵。

^① 米勒氏呼吸运动法是丹麦体育家米勒(J.P.Miller,1866—1916)所创,民国时期被介绍至中国。米勒研发的五分钟呼吸运动和十五分钟体育运动有助于学生身体健康,实施环境和条件较为便利,因此,南高师引进了米勒氏呼吸运动法。

三、江谦在通师的实践探索对当今教育发展的启示

20世纪初,近代教育正处于科举初废、新制待建的转型时期。西学东渐浪潮与传统文化思想碰撞搏击,被推至师范教育前沿的江谦与近代其他教育家们一起,“承担起推动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教育使命”^[25],谱写着教育救国的时代华章。江谦“三育并举”教育思想的实践探索无不透露着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他在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展现出的改革创新精神,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教育强国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江谦的教育事业从国文教习起步,他深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国学是各科之根本”“国粹是本”,设置经课以鼓励师生通过阅读“四书”“五经”来弥补道德教育之缺憾,提倡将古代传统礼节与时代发展之需相结合。江谦认为师学西方犹如移花接木,不可舍弃根基盲目学外,否则必会腐朽无力而伤及根本,此根基即为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他痛心并反对彼时“醉心欧化,鄙夷国学”的媚外现象。这些体现了江谦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捍卫,与今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与实践是一致的,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的历史阶段,具有显著的超前性。正因江谦在南高师创校之初确定了坚持“国学为本”的基调,南高师及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最终成为与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北大相抗衡的人文主义大本营^[26],验证了中国教育只有“深深扎根于它所存在的土壤,它才能拥有不竭的创新动力和源泉”^[27]。

必须指出的是,江谦倡导的文化主体性关注更多的是静态传统复刻,而非我们现今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更加注重的动态创新。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重塑国际话语体系,必须通过文化主体性的构建。而洗刷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也必须通过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28]在近代质疑儒学、否定儒学成为时代潮流之际,是全盘否定儒学,还是在保留儒学精髓的基础上进行教育改革,成为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江谦认为,儒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故儒学仍是我国的教育之本,不应被全盘否定和抛弃。这对我们当今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 坚持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发展

从封建旧儒中走出来的江谦努力摆脱旧教育的羁绊,面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发展对农、工、商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面对南通工业发展对水利、纺织、施工等各类人才的急切期待,审时度势,跳出传统教育“学而优则仕”的窠臼,形成人才培养要为近代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思维。

鉴于经济转型时期南通仍以农业为本的现实,江谦提出“教学之道三要四本”之说,明确指出“治农工商,务农为本”^[29],并对授课老师提出“当稍知农事”^{[1]65}的要求。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增设农作科和工作科,之后还开设了商业课程。农、工、商科的设置,“使得师范生在适应当时社会需要方面起了促进作用”^{[1]65}。不仅如此,通师的农工分科发展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黄炎培先生1917年来通师调查农工分科教育实绩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师范学校农工分科问题,各地虽有提倡,然无有贵校举办之早者,是足见贵校研究之结果正确而着实也”^{[2]218}。通师的农工分科发展始终以服务南通经济社会发展为方向,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学科设置紧贴地方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对南通近代化发展发挥了人才输送的关键作用,助推“通州之发达”及“一新世界”^[30]。

江谦在新旧教育转型时期注重学校教育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凸显其务实的改革创新精神,可以给当今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由于江谦着力培养的人才服务社会发展、适应社会转型的人才,他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重视修身教育、注重学生体育教学,较早地开展了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教育实践。他的具体做法,如将诚作为立校之本、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等,对今天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也有借鉴价值。此外,在人才培养的方式上,他看重学生“自动之能力”^[9](即自学能力)的培养,与今天一些学者提出的拔尖创新人才嵌入型培养方式中让学生“实现想自学、会自学、乐自学”^[31]的主张是一致的。

总之,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32],江谦在一个世纪前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教育史料征集编写办公室.南通市教育界人物传(1919年—1988年):征求意见稿[G].南通:南通市教育局,1988.
- [2] 朱嘉耀.南通师范学校史:第一卷[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6-120.
- [3] 赵娟.近代教育先驱:江谦生平及思想研究[M].扬州:广陵书社,2023.
- [4] 江谦.梦游记恩诗[M].上海:上海道德书局,1942:6.
- [5] 江谦.劝请续藏经启[N].大公报,1923-03-31(7).
- [6] 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G].南通:南通市政协委员会,1982:79.
- [7] 江易园先生讲演国文教授之根本[J].教育研究,1915(24):6-7.
- [8] 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
- [9] 南通师范学校最近之现状[J].教育周报(杭州),1916(140):27-30.
- [10] 十一月一日大总统策令黄炎培沈恩孚江谦均给予三等嘉禾章此令[N].申报,1915-11-3(2).
- [11] 陈乃林.张謇与通州师范[J].扬州师院学报,1980(4):72-77.
- [12] 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组,学报编辑部.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G].南京:南京大学,1982.
- [13] 左惟,袁久红,刘庆楚.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35.
- [14] 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求是,2023(18):4-8.
- [15] 江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J].吉林教育官报,1911(75):226-228;1911(76):229-231;1911(73):225-226.
- [16] 张謇.师范章程改订例言[M]//张謇.张謇全集:第五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96.
- [17] 江谦.小学教育改良之四案[J].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1911(1):159.
- [18] 黄炎培.两汉学风序[J].教育与职业,1931(120):101.
- [19] 黄炎培.两汉学风[J].机联会刊,1931(28):32.
- [20] 江苏省教育会讲演会纪要[N].申报,1915-06-11(10).
- [21] 江谦.南通农校课余杂志序[J].南通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4(4):3-4.
- [22] 江谦.两汉学风序[J].南通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5(5):2-3.
- [23] 光绪朝东华录(五)[M].张静庐,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8.
- [24] 江谦.校友会演说词[J].南通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7(7):15.
- [25] 李学林,周渝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时代意蕴[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3):1-10.
- [26] 张其昀.华冈学园的萌芽[M]//张其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17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9:9038-

9039.

- [27] 赵婷婷. 面向教育强国新要求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J]. 中国高教研究, 2025(6):5-14.
- [2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46.
- [29] 江谦. 教学简说[J]. 东方文化, 1927(3):9.
- [30] 陈罗孙. 通州之发达[M]//通州历史教科书. 南通:上洋书局, 1907:13.
- [31] 周海涛, 郝微微. 拔尖创新人才的嵌入型培养方式[J]. 民族教育研究, 2025(1):55-61.
- [32] 习近平.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J]. 求是, 2024(17):1-4.

Jiang Qian's Educational Exploration at Tongzhou Private Normal School (1902—1914)

ZHAO Ju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n Qiao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Jiang Qian was a renowned educator in China's modern era. In his early years, he worked at Tongzhou Private Normal School, the first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on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e participated in the founding of the school,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During his tenure, he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teaching method reform of Chinese, presided o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s, elevating it to a top-tier school nationwide. He has advanced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Nantong. Jia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elf-cultivation featuring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dhering to the philosophy of tak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foundation and industry as the application. He pushed forward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o foster the vigorous spirit. These teaching practice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fitness, which was implemented at Nanj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Jiang's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ideas offer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uphold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rinciple that talent cultivation contributes to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Jiang Qian; Tongzhou Private Normal School;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fitness; cultural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何敏敏〕